

盾与剑 (下)

[苏] 瓦季姆·科热夫尼科夫 著

蒋锡淮 常亮 戴炯 译

宫铁燕 张天俦 谢盛根



盾 与 剑

(下)

〔苏〕瓦季姆·科热夫尼科夫著

蒋锡准 常 亮 戴 炯 译

宫铁燕 张天传 谢盛根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二月

В. КОЖЕВНИКОВ
ЩИТ И МЕЧ
МОСКВА

盾 与 剑

(下)

【苏】瓦季姆·科热夫尼科夫著

蒋锡准 常亮 戴炯 译
官铁燕 张天俦 谢盛根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第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6 $\frac{3}{4}$ 字数365,000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319·03 定价: 3.0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对法西斯德国进行谍报工作的长篇小说。盾和剑是苏联公安人员配带的勤务符号上的标记。

全书以浩瀚的史料为背景，集中了千万个普通谍报工作人员真人真事的典型，通过主人公亚历山大·别洛夫的艺术形象，叙述了隐蔽战线上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1939年亚历山大·别洛夫化名约翰·魏斯，肩负着打入敌谍报要害部门收集情报的任务，随同党卫军要员的侄子海因里希·施瓦茨柯普夫由拉脱维亚移居德国。他巧妙地与敌周旋，当上了谍报局老牌特务施泰因格利茨的司机，潜伏了下来。在德军入侵苏联前夕将情报送回国内。在波兰，他领导了祖博夫的地下武装小组与敌人开展斗争。他争取了海因里希，使之转变为反法西斯战士，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他凭借机智和勇敢经受了种种“考验”，化险为夷，取得了敌人的信任，受到敌谍报头目的赏识和重用。魏斯利用种种机会，破坏了敌人派遣特务去苏联的工作，继而又打入敌保安处，担任秘密信使，出生入死，掌握了大量机密，揭露了英美和希姆莱等人秘密谈判企图单独媾和的内幕。最后，在德国土崩瓦解的前夜，破坏了敌人企图灭绝集中营的罪恶计划，拯救了一大批战俘的生命，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书中还通过主人公的活动叙述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反希特勒的密谋，杜勒斯派密使访德等等。此外，作者用相

当大的篇幅描述了第三帝国首脑人物希特勒、戈林、希姆莱、戈培尔、鲍曼，以及盖世太保和谍报界头目卡纳里斯、缪勒、卡尔登勃鲁纳等人的滔天罪行，他们的丑恶形象和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内幕以及荒淫无耻的私生活。

小说情节错综复杂，惊险曲折，高潮此起彼伏，峰峦重叠，引人入胜。人物刻划栩栩如生，文笔细腻生动，读后有身临其境之感。

希特勒

(下)

(38)

华沙谍报学校妇女分校校长，德国人利朋苏联叛徒和卖国贼拼凑的所谓俄国解放军的上尉克拉拉-克拉夫季娅·奥夫鲍姆-泽连科，是一个有教养而且富于处世经验的妇女。

早在1920年，根据她的要求她丈夫弗里茨·奥夫鲍姆，这个前比利时公司附属顿涅茨矿山的会计，不仅改了姓，而且改了专业，从而得以在苏维埃政权下升任总工程师的职位。这在当时一点也不奇怪，因为那时对有技术专长的知识分子特别需要。这位新任总工程师虽然知识不足，但他有自己的长处，如善于和下属相处，少言寡语以及绝对执行每个领导的指示，从而得到弥补。他是一个智力不高然而却很大胆的冒名顶替者。因为他认定，俄国人和乌克兰人都是些半开化的民族，而他作为一个纯种欧洲人，领导他们足足有余。

克拉夫季娅·泽连科醉心于乌克兰的古风，并且在人文杂志上发表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后来，当她丈夫调到布良斯克时，她又对俄罗斯的古风表现了兴趣。

那一时期，正从以创造劳动纪录而闻名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中间培养生产指挥人员，克拉夫季娅·泽连科受聘给这

些可尊敬的成年人上德语课。这就使她有机会和那些后来领导大型企业的人们建立了联系。

她为人勤奋，把一些德文技术文献译成了俄文，挣了不少钱。以后她又把德国出版商感兴趣的苏联冶金学家和采煤专家的著作从俄文译成德文。

费多尔·泽连科曾好几次出差德国。由于他是德意志人，德国人便对他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并企图雇用他。他们向他提出了各种建议和许诺，但他仔细思量以后，采取了拒绝的态度，因为他觉得在苏联的地位是巩固、可靠而有前途的，比起充当德国间谍更具有吸引力。

回国后，他把德国人的建议向国家政治保安局作了报告，同时将此事也告诉了自己的妻子。他提供的情报增强了人们对他的信任，而他妻子的反映则有些出乎意外。

克拉瓦-克拉拉是一个非常热情而富有想象力的女性，她不仅把这件事看成具有某种浪漫主义色彩的东西，而且还燃起了对自己祖先的国土狂热的思念。于是便违背了丈夫的意志，同她所在出版社的一个工作人员——原是一个德国特务——发生了联系。

克拉瓦-克拉拉被这种新的活动所鼓舞，便想象自己俨然是一位当代的玛塔·哈里了。她甚至变得漂亮起来，这是因为忙忙碌碌的事务使她消瘦了些，从而恢复了姑娘体态的缘故。

然而这时，泽连科-奥夫鲍姆家庭遭到一次完全意想不到的打击。

他们有一个15岁的儿子，是个共青团员。他和其他共青团员一样，把建设社会主义的豪迈事业，看作是自己精神力量的源泉。

保尔·柯察金的形象是他们的理想。他放弃了学习，不顾父母的拦阻，参加了青年工作队，支援一个未完成生产任务的矿山。

他们发狂地、忘我地工作，但仍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因为他们没有经验、体力不足，不能完成工作定额。

在青年工作队，到处洋溢着平等和友爱的精神，然而他们实行的却是一种很糟糕的平均主义。

有一次，儿子回家想洗个澡，饱饱地吃上一天，好把几天吃不饱的肚子填补起来。夜里，他听到父亲低声坚决要求母亲停止跟那个特务来往。

儿子一下闯进了父母的卧室，惊恐地问：

“这是真的吗？”

克拉瓦-克拉拉在她丈夫和儿子对她把话说完以后，绝望地喊叫道：

“你们去告发我吧！”

“那好，我就去报告，”儿子说，接着便挣脱了父亲企图阻拦他的双手，离家而去。

天亮时，费多尔·泽连科走进汽车房时，发现儿子在那里上吊死了。

费多尔·泽连科遭受这次不幸的打击之后，便失去了阻止其妻继续同特务勾搭的力量，而克拉瓦-克拉拉则由于这意外的震惊产生神经错乱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1937年克拉瓦-克拉拉的丈夫被逮捕，而她本人却逍遥法外。

从精神病医院出来后，她被一种渴求为丈夫报仇的疯狂劲所驱使，企图恢复与德国特务中断了的联系，但是，德国特务拒绝了她的效劳，理由是：第一，她现在是一个被镇压

者的妻子，可能处于被监视的状态。第二，她由于儿子自杀曾拒绝做特务工作，这是一种不可原谅的动摇。

克拉瓦-克拉拉从前的学生，一位著名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现在是一位知名的工业方面的管理人员，对她怀有一种感激的心情，帮她逃脱了当时大多数其他受镇压者妻子的命运。

她获得了一个十年制学校教职员的职位，随后不久又当上了学校的校长。

当德军占领了克拉瓦-克拉拉所居住的城市时，她被关进了集中营。德国人把她拘押了几个月，对她进行了全面的审查以后，将她编入“俄国解放军”当翻译，以后考虑到她工作勤奋和具有德意志人的血统，经盖世太保同意又授予她上尉军衔和谍报学校妇女分校校长的职位。

这所学校和华沙学校一样，位于别墅区，培养女谍报报务员。训练期限为6个月。

然后，女学员们统统被送到华沙总校，在那里还要同男子一起受训1个月。训练过程中每个女学员都要和一个男学员搭配在一起训练。

“瓦利总部”领导人认为，利用妇女充当无线电报务员较之男子更为可取。因为适龄服兵役的男子长期住在一个地方，比妇女也容易引起怀疑，而且妇女可以伪装成从德国人占领区逃出来的难民或被疏散人员，甚至可以博得本地居民的同情。

全部女学员都是从集中营和监狱里招募来的，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在那里对她们进行了预备性考查。然后要她们签字画押，把她们送到学校。

活动在占领区的谍报组、警察局、守备队，都给学校一

定的援助，向它提供经过实践考查的骨干。

这些享有特权的女人，到这里来时不是由卫队押解，而是由陪伴人员相随。她们看上去，气色很不错，穿着也颇讲究，起初举止行为甚至有些放肆。但是克拉拉·奥夫鲍姆上尉以其特有的方式很快便让她们明白，这里不是妓院，而是谍报学校，它有一个甚至比军队更为严格的制度。

事实上，奥夫鲍姆上尉本人从来没有采用过体罚的手段进行教育。

做这项工作的有一个专职人员——校长的政治副手，“俄国解放军”中尉，她高傲地自称因加·拉特米罗娃，但是人们还是只称呼她“纽尔卡”，她是一个身材不高却很粗壮的女人，宽肩膀，掀起的肥胖臀部把马裤绷得紧紧的，头发剪的很短，平整的刘海儿低低地披在额头，还有因吸烟熏染成褐色的一口牙齿。她有男子般的举止作风和象男子一样的坏习气。

这个职业女刑事犯，监狱和集中营生活的老手，还在监狱时就曾打报告要求把她送往前线，于是她被派到部队当了卫生员。后来她成了俘虏，德国士兵在她的救护包里发现很多手表、烟盒，一叠叠揉皱的纸币。

她差一点儿没被打死，因为她的盗窃行径激起士兵无比的愤怒。但是盖世太保认为，那是她对帝国有用的最好证明，这个女盗窃犯被免于处决，后来又得到一封附有极好评语的介绍，被派遣到后方编入“俄国解放军”服务。

从占领区来的妇女，有和德国人合作的经验，也善于同他们打交道，而且她们也没有丧失身体的健康。因此，每当纽尔卡企图表现自己某种特殊嗜好的时候，每当她对一些盖世太保监狱里被拷打和审讯折磨得精疲力尽的姑娘，假惺惺

地表示关心，企图逼她们老实就范的时候，这些妇女便对她进行坚决的反击。

克拉拉·奥夫鲍姆上尉则与众不同，她举止端庄脱俗，尽管她已是40岁开外的人了，但由于生活调理得好，看上去仍很年轻。穿在她身上的制服很合体，她那清秀的脸庞，尖尖的鼻子，侧面看上去酷似一只鸟，修长的颈项上见不到一丝皱纹。

一些中年以上的温文尔雅的谍报官员，很想和她建立惬意的爱慕关系，个别人甚至想和她建立夫妻关系，然而她勇敢地谢绝了各种追求，她认为在丈夫还在世的时候，嫁人是不道德的。而短时间的苟且关系，则有失她的人格。

纽尔卡的恶劣行径很自然地引起克拉拉·奥夫鲍姆的厌恶。但是，她由于内心里对这个一旦狂怒一切都干得出来的女刑事犯存在畏惧心理，因此采取克制态度，为了对自己政治副手的下流行为表示抗议，她便冷酷无情地迫害那些得到纽尔卡宠爱的女学员。

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过失，她就将她们除名送回集中营。要是严重犯规，则送到离学校不远的党卫军小分队去。这个小分队在一个垃圾场专门从事清除工作，周围遍立柱子，上面钉着写有“禁区”字样的牌子，这是每逢枪杀人时司空见惯的事。

每当谍报局的官员到学校来视察总务，财政和训练诸方面工作的时候，奥夫鲍姆上尉总是倍加殷勤地接待他们，常常亲自指点准备午餐和晚餐，让“客人们”享受一次家常饭菜。早在顿巴斯时期，她就学会了用各种浆果做出可口的果子酒，经常博得客人们对自己手艺的赞赏。

用完丰盛的晚餐，客人们酒足饭饱。为了摆脱他们那种

有损于她女人的和军官的自尊心的胡搅蛮缠，奥夫鲍姆上尉便抓住时机，热情建议一个作风轻浮的客人去看她的女学员附有照片的档案。要是有什么问题引起客人的注意，她便说，他可以直接到他感兴趣的女学员那里得到补充材料，并命令把这个女学员叫到专门为招待谍报局的视察官员而准备的房间来。

奥夫鲍姆上尉用以摆脱军衔或者职务比自己高的军官那种粗俗作风的手段，往往引起自己副手的愤怒和抗议。但是这种愤怒和抗议与其说是出自道德方面的考虑，不如说是出自卑鄙的忌妒心。

理解到这一点，奥夫鲍姆上尉便严厉地进行适当的训诫，并命令道：

“中尉，立正！向后转走！”

纽尔卡中尉不得不服从神圣的军事纪律，在谍报局犹如在武装部队一样，必须绝对服从。

威廉·卡纳里斯，这个鲁尔钢铁公司经理的儿子，“不来梅”号巡洋舰上一位外表漂亮的军官，他是在这个浮动基地上开始致力于德国谍报专业的，这一专业使他现在上升到谍报局长这一高级职位。

卡纳里斯被公认具有上流社会的风度，他好发表一些抽象的哲学议论，每当这时，他总是力求回避说出直接而明确的概念。

盖世太保首脑海德里希，这位同样出身于“不来梅”号巡洋舰的前军官，曾经由于恶劣的行径被舰队解除了职务。卡纳里斯和他的友谊，并不是建立在青年时期美好回忆的基础上。

他们俩有一切理由相互害怕，相互蔑视和相互仇视。

他们由于都具有其独具的勇敢和狡诈相间的性格，便都认为表面上的友好较之公开的仇视更可取，近距离的角力要比远距离的战斗为好，但是不管距离远近，这种搏斗对于双方都同样是危险的。

卡纳里斯最成功的谍报活动，通常是依靠德国工商界企业家进行的。他们利用自己的国际联系，很乐意而且很方便地就完成了谍报局可委托的同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相一致的情报任务。除了上述情报活动外，各大公司还有自己专设的情报机构。

卡纳里斯从德国工业巨头那里，也就是从作为美、英、法各国大工业资本家同伙的那些人的嘴里，为元首获得了极为珍贵的情报。

对于工商界这种相互交换业务情报的活动，只有那些极端不通人情的和没有教养的人才会把它称作损害自己国家安全的谍报活动。这种活动给工商界的富翁提供奇迹般的可靠红利，即使在那些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这种红利也是有保证的。

当然，卡纳里斯并不是把那些从国外旅行回来的德国大公司经理看作庸俗的特务，而从谍报局的专用基金中拿出钱来付给他们谍报酬金。相反，他们倒挺乐意为帝国的部长，元帅和将军们提供酬金，争取这些人向德国的康采恩加大军事订货。除此之外，经理们还想获得适当的津贴，以便更快地凭从外国同伙那里得到的专利开始供货，因为那些外国同伙的企业也在完成本国政府的订货。

例如，在德国的“卡尔·蔡司”公司与美国的“鲍希和罗姆”公司之间就建立了完全兄弟式的商业关系，美国为了讨

好尊敬的伙伴，当自己的盟国——英国——要求完成光学仪器订货时，就曾予以拒绝。

大家都知道，在德国建立的生产军用品的“奥培尔”汽车制造厂，就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资产。

至于说到鲁尔区的统治者古戈·斯汀尼斯，他很有先见之明地在海外建立起“古戈·斯汀尼斯工业公司”（在纽约），在英国的格拉斯哥市中心，也高高耸立着挂有“古戈·斯汀尼斯有限公司”牌子的大楼，应当指出，当种族主义德国横行无忌的时候，德国的资本巨头却可以不受任何约束，他们不仅和那些经不起帝国种族考查的外国统治者家族结成密切的金融关系，而且和他们结成亲属关系。

为了鞭策希特勒加紧其侵略阴谋，鲁尔的工业家们对稍许夸大美、英、法三国军事实力的情报很感兴趣，为了加强军事生产，他们妄图利用国内的一切法西斯恐怖手段，来镇压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

不仅如此，他们还希望希特勒对苏联的军事实力没有一个真实的概念，因为这可以使他在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用武的狂热方面稍许失去理智的控制。而且德国资本巨头的外国同伙有时还会做出相当宽容的让步，其目的就是希望希特勒德国在实行东进以后，能够为他们那个把资本和政治愿望结合起来的公司的繁荣，创造最肥沃的土壤。

于是，威廉·卡纳里斯对资本巨头向他提供情报所付的报酬，仅仅是在规定的方面和前提下，向元首报告情况而已。

至于海德里希，他的使命是在国内外开展情报活动，这方面他搞得很顺利，取得了丰富的经验。

海德里希在外围谍报和反谍报活动方面，和卡纳里斯的竞争不怎么得手，这是因为他不象对手那样，拥有一批从事

这方面活动的得力的下属。

为了从外国政界人物那里弄到情报，卡纳里斯利用帝国世袭名门贵族的嫡亲家族为他效力，这些家族都是在有爵位贵族的家族录——哥特族谱上赫赫有名的。

诚然，他不得不大大地破例动用谍报局保密基金里的西方硬通货，然而，这种费用一向被证明是值得的。

这些人由于有很高的爵位，即使没有担任正式的国家职务，他们在外国通过和自己身分相当的人物接触，也能够轻松自如地似乎在不知不觉之中，探询出极重要的政治秘密。在所谓的上层社会里这种秘密的意义，较之损伤家族荣誉的那件家庭秘密来说，根本不值一提。

在这方面，比如霍亨洛亲王，就表现出特殊的才干。

难道法国元帅贝当的效劳没有价值吗？早在他担任法国驻马德里大使时期，他就向佛朗哥系统地通报了法国武装力量的情况，因为他确信，这必将很快为希特勒所知悉，而且他透露情报的那番诚意一定不会被忘记。

而那位臭名远扬的美国人查尔斯·林德伯格，元首的崇拜者，在伦敦却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这位美国的民族英雄居然以奴才般的忠诚，客观地通知其德国朋友关于美国大不列颠空军的动向。

还有梵蒂冈的效力……

是的，卡纳里斯可以让自己扮演一个知识渊博的美食品评尝家，艺术品保护人，达克斯狗的钟爱者，也可以扮演一个醉心于吹奏长笛，在温室里培养热带植物的怪人，也可以穿上燕尾服，在自己的郊区别墅里，以只有德国上层显贵和工业大亨们才有的感情和礼貌，接待那些间谍。

尽管在海德里希和卡纳里斯之间的活动范围已有了正式

的划分——卡纳里斯搞外国情报，海德里希搞国内情报——，他们俩还是力求悄悄地钻进对方的猎区。

海德里希的目的在于监视谍报局，卡纳里斯的目的在于搜集统治集团内部的丑闻，尽可能多地掌握关于那些已混进统治集团内的人的材料，以便一旦需要将他们捏在自己的手心。

每个人都想在这场明争暗斗中捕捉对方，把他贩卖，将其家当攫为己有。

在一局家庭槌球戏结束之后，卡纳里斯和海德里希便把他们的妻子留在花园里，回到办公室单独交谈，等待吃午饭。

海德里希甚至在玩槌球时都不愿解开制服的纽扣。

他和通常一样，古板地保持着端庄的仪容，要是他输了，便把他的薄嘴唇咬得发白。

卡纳里斯则完全不同，他在装束方面并不拘束，当他输球时，他也会欢笑，会为对方的胜利而高兴，致使后者产生一种不由自主的苦脑；要是这胜利只是给自己带来满足，值得那么卖劲地去争夺吗？

海德里希简要地对卡纳里斯读了他得到的一份报告，其中读到谍报局的女谍报学校里一个学员谋杀盖世太保工作人员未遂的事件。

“我知道，”卡纳里斯懒洋洋地说。“那是一个患有歇斯底里病的女人。”并警告似地指出：“如果您的手下人不懂得人所共知的那种和我们学校之间的区别，而做出那种下流举动的话，那末不是我，而是您，应当对他们训诫一番。”接着又挖苦地补充说：“实际上，您对女特务进行工作具有丰富的经验。当您担任秘密刑警局长时，柏林的职业娼妓似乎组成了您的最可靠的特务网吧？这里嘛，则是另一类人。

她们显然还没有丧失妇女名誉的某些概念。”

“我不知道，您的学校居然是和贵族女子寄宿学校一样。”海德里希讥讽地说。

卡纳里斯温厚地笑了笑。

“听我说，我亲爱的朋友！由于生物本性，上帝亲自安排了妇女从属于我们男人。同时我们男人，按照生理学法则，在一定程度上也从属于妇女。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受我们的潜在本能的支配，忽视它的作用，即是有害的，也是危险的。”这最后一句话，他是用威胁的语调着重地说出来的。

“难道我面临着这种危险吗？”

“您这说到哪儿去啦！”卡纳里斯抗议说，“我只是指出一点：希望您能同意，您的那位二级下士出院以后应当受到惩处。要知道，他的行为差点儿毁了我们正在为执行一项重要任务而训练的一个难得的人。现在嘛，由于这个人，险些儿失去必要的幻想，这项任务不可容忍地后延了。人不能没有幻想，不然就会变成野人了。我们都是幻想的牺牲品。”卡叹了口气，接着又说：“就拿我来说吧，总幻想成为一个著名的音乐家。”他伤心地摊开两手。“可是结果怎样呢？连您也不会说‘卡纳里斯是个吹长笛的能手’这样一句安慰话吧。据我了解，”他迷人地笑了笑，“您到说过完全相反的一些话。另外，据资料反映（在读到一个不太伤害我的自尊心的问题时，您居然会说出这样一种想象，似乎我认为，为了联合对俄作战，英国部队在我国领土上登陆比我们的部队在英国登陆要好。”

海德里希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直盯着。

“顺便说说，”卡纳里斯同样留神地盯住海德里希，认